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构建与反思

祝朝伟 著

Cotton, Nathaniel, and Samuel Mather—sons of Increase Mather, the college's president. Prodigies. Cotton, the eldest, entered Harvard at fifteen when he graduated in 1678; his brothers followed him at sixteen. Cotton excelled in ancient languages and in mathematics.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during church sermons by taking notes in Latin and no doubt as a child, he seems to have been a prodigy. "I am able with little study to write in several languages," he declared; "I feast myself with the sweets of all the learned world." The more polite part of mankind ordinarily paid him great deference. A small plaque over his study door was a warning to visitors: "He who enters here must leave his pride at the door." Mather supported the Salem witch trials of 1692 and later became president of Yale. He taught himself in 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 where he studied law and medicine. He was offered a professorship at Yale at his suggestion. Mather was offered Yale's presidency three times, but he declined it: he wished to be president of Harvard. He was offered the presidency of Harvard over, however, on three occasions.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ollege do again . . . treat me with their avarice and ingratitude," he wrote in 1724, after the third rebuff.

e appealing prodigy was Truman Henry Hovey. As a child in Royalton, Vermont, h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or his remarkable calculating ability as a "lightning calculator" that he was invited to demonstrate before the New Haven Academy. He was examined by a committee of the Academy and found to be a prodigious calculator. At the behest of President Edward Everett, Hovey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building of the New Haven Academy.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13

构建与反思

— 庞德翻译理论研究

祝朝伟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建与反思: 庞德翻译理论研究 / 祝朝伟著.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 - 5327 - 3845 - 0

I. 构... II. 祝... III. 翻译理论—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14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构建与反思

——庞德翻译理论研究

祝朝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625 捆页 2 字数 328,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册

ISBN 7 - 5327 - 3845 - 0/H · 710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一直在线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5年9月18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节 庞德传奇而富有悲剧的一生及其主要著作 | 3 |
| 第二节 中西方庞德研究综述及存在的问题 | 8 |
| 第三节 庞德翻译在翻译文艺派理论参照下的意义 | 25 |
| 第四节 正视庞德/林纾现象、促进翻译理论研究 | 29 |
| 第一章 庞德翻译思想综述 | 37 |
| 第一节 庞德的翻译历程与主要翻译作品 | 40 |
| 第二节 翻译与创作、原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庞德翻译实践的启示 | 52 |
| 第三节 庞德的其他翻译思想主张 | 61 |
| 第二章 目的论与翻译改写理论视域中的庞德翻译思想 | 81 |
| 第一节 翻译目的论的主要理论理据 | 85 |
| 第二节 庞德翻译在翻译目的论参照下的意义向度 | 89 |
| 第三节 改写理论的主要理论理据 | 100 |

目 录

Contents

| | |
|--------------------------------------|------|
| 第四节 改写理论的启示:意识形态与诗学因素对庞德翻译的影响 | /105 |
| <hr/> | |
| 第三章 庞德翻译的本体论研究 | |
| 第一节 意义的先设与翻译的意义本体 | /126 |
| 第二节 庞德翻译思想的本体 | /131 |
| 第三节 庞德语言能量本体对传统译论意义本体的颠覆 | /135 |
| 第四节 庞德对意义的互文式阐发赋予“理解”以新的维度 | /143 |
| 第五节 庞德的语言能量本体对原作者意图的废黜 | /147 |
| <hr/> | |
| 第四章 庞德翻译思想的方法论研究 | |
| 第一节 庞德的翻译过程与翻译方法 | /153 |
| 第二节 庞德意象并置手法的理论理据 | /157 |
| 第三节 庞德翻译方法的运作与情感之韵的重奏 | /171 |
| <hr/> | |
| 第五章 庞德翻译对美国诗歌的创新 | |
| 第一节 日日新:庞德的创新诗学 | /191 |
| 第二节 美国诗歌的现代性与庞德的贡献 | /194 |

目 录

目录
Contents

索引
Index

| | |
|--------------------------------|------------|
| 第二章 庞德对英美诗歌的贡献 | 201 |
| 第二节 绝对情感:庞德对英语诗歌抒情方式的创新 | /202 |
| 第三节 绝对节奏与自由诗:庞德对英语诗歌韵律的创新 | /214 |
| 第四节 现代性的诉求:庞德诗歌翻译对美国诗歌主题和用词的创新 | /226 |
| 第五节 庞德对英语诗歌其他方面的创新 | /237 |
| 第六章 庞德翻译中的道家美学 | 247 |
| 第一节 语言的危机与“立象尽意” | /249 |
| 第二节 意象并置与“以物观物” | /255 |
| 第三节 决不说教与“去情去我” | /262 |
| 第四节 绝对暗喻与无言诗学 | /269 |
| 第五节 诗画交融:庞德诗与中国画 | /276 |
| 第七章 庞德翻译中的儒家思想 | 283 |
| 第一节 借鉴与吸收:孔子是一剂良药 | /286 |
| 第二节 表意文字法:庞德的美学与诗学视角 | /296 |
| 第三节 “译者,易也”:庞德对儒家思想的变易与改造 | /302 |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他山之石：庞德翻译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兼论庞德研究中的东方主义视角 /317

第一节 对庞德研究中东方主义视角的质疑 /320

第二节 庞德翻译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327

第三节 误读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 /338

结语 /345

附录一 《华夏集》中英文对照 /357

附录二 庞德大事年表 /391

参考文献 /405

后记 /421

绪 论

那些善于保护火的人

能读到旦 tan, 黎明

——庞德(《诗章》91)

在 20 世纪英美诗歌史上,涌现了叶芝、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等一大批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庞德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他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翻译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集《华夏集》(Cathay),发动了英美诗歌史上声势浩大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他创作了英美诗歌史上最长的诗歌《诗章》(The Cantos),全诗凡 117 章,用 18 种语言写成,包括数量可观的汉字;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在罗马广播电台宣讲法西斯言论,但战后却因其杰出的诗学成就获得了美国的诗歌大奖博林根奖(Bollingen Prize)。那么,庞德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第一节

庞德传奇而富有悲剧的一生及其主要著作

伊兹拉·庞德(Ezra L. Pound, 1885—1972)的一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富有悲剧的一生。他 1885 年 10 月 30 日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一个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荷马·庞德(Homer Pound)是美国国土办公室的主管,祖父撒迪厄斯·庞德(Thaddeus Pound)曾任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这给幼小的庞德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立志“投身于公共服务。”^①虽然庞德少年时家道中落,家里非常贫穷,是在当地上的小学,

^① Wendy Stallard Flory, *The American Ezra Pou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

但他十五岁便已立下大志,梦想成为一名诗人,开始学习必要的诗歌技巧。庞德曾发誓,到他30岁时要在诗歌的知识方面胜过任何与他同时代的人。^①怀着这样的梦想,庞德来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艺术与科学,他在那儿遇到了画家史密斯(W. B. Smith)和后来的现代主义诗人威廉斯(W. C. Williams)与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并系统地学习了英文写作、英语语言、代数、几何、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伦理学、逻辑学以及卡塔鲁斯(Catullus)、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奥维德、维吉尔和卢克莱修(Lucretius)等人的拉丁文作品,为其以后的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庞德发表了自己的处女诗作《赶路的伊兹拉》(*Ezra on the Strike*)。后来,庞德到汉密尔顿大学继续学习,接触了但丁的作品,极大地开阔了庞德的文学视域。据说,他创作鸿篇巨制《诗章》的念头就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虽然他最初只是想为罗马王子的爱妃玛罗西娅(Marcia)创作一部三部曲而已。^②

1908年,庞德怀里揣着仅有的三英镑和几本《熄灭的细烛》(*A Lume Spento*),只身来到了英国伦敦。他先后结识了叶芝、福特(Ford Madox Ford)、休姆(T. E. Hulme)、阿尔丁顿(Richard Ardington)、门罗(Harriet Monroe)、弗莱彻(Gould Fletcher)、洛威尔(Amy Lowell)、艾略特(T. S. Eliot)以及布雷泽斯卡(Henry Gaudier-Brzeska)等人。后来,庞德获得了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通过其遗孀转赠的手稿,手稿中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记述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从而引发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标志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但是很快,意象主义阵营的内部出现了意见的分歧,主要成员艾米·洛威尔与庞德发生了矛盾,于是后者脱离了意象主

^① Noel Stock, *The Life of Ezra Poun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 34.

^② 同上, p. 42.

义运动,把前者所领导的运动称之为“艾象主义”,并和刘易斯(Wyndham Lewis)另起炉灶,发起了另一运动,即漩涡主义运动。意象主义运动虽然短暂,但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启蒙诗人”,是为现代主义这所“培养诗人的高等学府”输送人才的“学校”。^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庞德一边进行其《诗章》的创作,一边开始对道格拉斯少校(C. H. Douglas)的经济思想产生兴趣。庞德对道格拉斯以及奥兰奇(A. R. Orage)社会信贷理论的错误笃信,加上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者法克(Fack)、库根(Gertrude Coogan)和考夫林(Coughlin)的影响,逐渐由激进的经济学家沦为支持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②他还在罗马广播电台发表反犹太的言论,并因此被美国以叛国罪逮捕,关押在意大利城市比萨南部的集中营里(后关押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达12年之久)。庞德在此创作了举世闻名的《比萨诗章》。经过艾略特、弗罗斯特、麦克利什、海明威以及肯明斯等一大批名诗人、名作家的多方奔走和努力营救,庞德终于获得释放重获自由。1949年,庞德的《比萨诗章》为他赢得了美国首届博林根诗歌大奖。此后,庞德回到意大利,一方面反省自己的错误,一方面继续进行后续《诗章》的写作。

庞德的一生著述颇丰,先后出版诗集、文学评论以及翻译作品20余部,包括诗歌巨作《诗章》(*The Cantos 1—117*, 1970),诗集《人格面具》(*Personae*, 1909),《熄灭的细烛》(*A Lume Spento*, 1908),《这个圣诞节的赞歌》(*A Quinzaine for this Yule*, 1908),《狂喜》(*Exultations*, 1909),《坎佐尼抒情诗》(*Canzoni*, 1911),《反击》(*Ripostes*, 1912),《大祓集》(*Lustra*, 1916)和《休·赛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 1920);文学论文及散文集《罗曼司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ce*, 1910),《高迪埃一布雷

^①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81页。

^② Leon Surette, *Pound in Purgatory: From Economic Radicalism to Anti-Semit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9.